

【统战工作研究】

# 论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侯新养

(长安大学 人文社科部,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西安事变从爆发到最终和平解决, 中国共产党在其整个过程中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从四个方面对此作了全面详尽的论述。

**关键词:**中共; 西安事变; 联共抗日; 蒋介石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 Func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Xi'an Incident

HOU Xin-ya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the outbreak of Xi'an Incident and its final peaceful solu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nd made an active contribution, and about this, a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exposition is given in four aspects.

**Key word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Xi'an Incident; alliance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resist Japan; CHIANG Kai-shek

1936年12月12日,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急时刻,张学良和杨虎城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迫使其答应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要求。西安事变是时局转换的枢纽,国共两党从此结束了十年内战,开始团结携手,共御外侮,为八年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对于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这一历史事件,目前学术界关于张、杨二将军、国民党政府、宋氏兄妹与端纳、各派军阀甚至蒋介石在事变中的作用多有论述,但对于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却鲜见论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疏漏和缺憾,本文拟对此作一全面而详尽的论述。

### 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是西安事变爆发的重要原因

西安事变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事件,它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在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内忧外患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各种矛盾的总爆发,也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中共对张、杨二

将军长期争取的结果。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挑起了侵华战争。在这危急时刻,蒋介石却采取不抵抗政策,一味妥协退让,东北守军张学良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不放一枪一炮就撤回关内,这样,在短短的三个月内,东北三省就沦于日寇的铁骑蹂躏之下。从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由过去的阶级矛盾逐渐转变为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把日寇赶出中国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中共逐步调整自己的政策,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工作的重点。早在1933年1月,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并支持了冯玉祥、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局部抗战。1935年5月,华北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共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明确指出:“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

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sup>[1]</sup>。1935年12月,中共又召开了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会后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全面论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标志着我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及策略路线的基本形成。瓦窑堡会议后,中共积极地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把过去“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另一方面把争取张学良和杨虎城及其所领导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作为统战工作的重点和主要内容,以首先建立西北地区“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为开端,来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对张、杨的争取工作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的:

1. 对被俘的张、杨部属进行抗日爱国教育,通过他们来影响张、杨。凡被俘虏的官兵,红军都以礼相待,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去留自选,愿回家的发给路费,愿参加红军的可以留下。红军还对他们进行爱国教育,给他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这些被俘的官兵被红军的精神和行为深深触动,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有的回到东北军后,以所见所闻主动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服东北军联共抗日,成为我党的义务宣传员,对整个东北军转向抗日起了很好的推进作用。特别是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619团团团长高福源经过红军的教育,思想有了极大的转变,主动要求回东北军去说服张学良联共抗日,后来红军就是通过他同东北军建立起了联系。

2. 通过信件来往等形式做张、杨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主要领导人,曾多次写信给张、杨,及时给他们通报国共谈判等情况,帮助他们认清形势,争取他们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为了加强对东北军的工作,中共中央专门设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发表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呼吁东北军停战抗日。1936年初,毛泽东又通过高福源写信给张学良,向他宣传党的抗日政策,表示愿意同东北军停战抗日。对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毛泽东也曾于1935年12月派汪锋持亲笔信密赴西安,同其进行停战谈判。

3. 在战争前线,红军对东北军进行政治宣传工作。他们在前沿阵地上到处都挂着标语,上书“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等,有的还用小喇叭

呼着相似的口号。随着前线战事的停息,红军和东北军的往来也逐渐增多,双方经常一起联欢,共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戏剧,宣传抗日救亡,互相激励斗志。这样,红军和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已经在下层逐渐建立起来。

4. 直接争取张、杨,同其秘密谈判,签定互不侵犯、停战抗日的协议。经过中共长期大量艰苦的争取工作,张、杨逐渐接受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3月,中共中央派李克农在洛川同张学良进行了密谈,张表示希望会见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仅过了一个月,中共就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与张学良在肤施(延安)会谈,双方在停止内战、逼蒋抗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互派代表等方面达成了初步协定,对张学良最后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影响很大。此后,刘鼎被派驻东北军作为中共代表,帮助张学良。红军参谋长叶剑英也前往西安,协助了张、杨改造部队,准备抗日。对杨虎城及其十七路军,早在1935年底,毛泽东就派汪锋前去联络,1936年2月,中共北方局的王世英在西安与杨达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联合抗日等协议。同年4月,与杨关系甚密的王炳南又被中共派回杨部做统战工作。到1936年5月,经过艰苦工作,红军与十七路军正式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

经过中共的争取和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张学良和杨虎城被争取到抗日阵线这一方来,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率先达成了互不侵犯、团结抗日的协议,从而实现了“三位一体”的西北地区抗日大联合,这对推动张、杨发动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没有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没有中共的争取和帮助,没有红军的支持,没有“三位一体”的大联合,张、杨是不敢贸然发动西安事变的。中共虽然没有直接参预西安事变的准备和发动,但中共和红军是张、杨的强大后方,使其实现逼蒋抗日的主张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 二、中共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积极倡导者

西安事变的准备和发动时间很短,又十分保密,所以包括中共在内,事前谁也没有料到。而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却虎视眈眈,欲独吞中国,整个中华民族都面临着抗击日寇的紧迫任务。在这重要的历史时刻,爆发了西安事变,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以及国内各党派、各阶级阶层和各种政治势力的极大关注,他们

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沉默观望者有之,咒骂责难者有之,同情支持者亦有之。

在国际上,日本帝国主义最希望由此引起中国更大规模的内战,以实现其独霸中国的梦想。时任日本外相的有田曾对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许世英表示:“如以抗日容共之条件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sup>[1]</sup>。其反对和平解决的野心昭然若揭。而英美等国则担心西安事变给日本可乘之机,威胁其在华利益,故不希望中国形势恶化,主张和平解决。苏联因为不了解真相,对西安事变持否定态度,认为其“足以破坏中国统一,减少中国力量”<sup>[1]</sup>,但主张和平解决,以免为日本所利用。另外,德国、法国、意大利等都注视着西安事变的进一步发展。

在国内,西安事变的爆发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国民党南京政府乱作一团,连夜开会,以“冒犯长官、劫持主帅”<sup>[1]</sup>的罪名,下令“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加以严办。同时,亲日派和亲英美派在政府内展开了激烈的争斗,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一面勾结日本,一面致电西安,要求张、杨限期交出蒋介石,否则“必率全军指日西上”<sup>[1]</sup>,并自任讨逆军总司令,指挥中央军西进潼关,派飞机在西安上空示威,轰炸渭南、三原等地,威胁西安。他们的目的就是欲置蒋介石于死地,自己取而代之,充当日本的走狗。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亲英美派看到何应钦是“戏中有戏”,一方面反对讨伐,一方面积极营救蒋介石,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其它各地军阀和实力派,也是态度各异,老奸巨猾的阎锡山事变前后判若两人,事变前套近张学良,事变后却去电质问张:“第一,兄等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sup>[1]</sup>。企图从中渔利;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绥远的傅作义等与蒋矛盾较大,同情支持扣蒋行动,而冀鲁一带的韩复榘、宋哲元以及新疆的盛世才、云南的卢汉等则态度暧昧,模棱两可。

西安事变爆发后,整个中国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紧张局势,西安事变何以解决?这是摆在中共党人面前的一个紧迫而又复杂的问题,这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契机!西安事变解决的好,可以促成全国抗日力量的大团结,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西安事变解决不好,可能会引发全国大规模的內战,则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在这样一个需要立即做出历史抉择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前途作

了科学的分析,明确指出:“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的一部分,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这次发动是为了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sup>[1]</sup>。基于这样的分析与判断,党中央和毛泽东逐步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分别于1936年12月15日和19日两次通电全国,对张、杨予以政治上的支持,坚决反对亲日派借机发动内战。同时,中共还发布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希望“南京与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sup>[1]</sup>。以此为标志,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就明确地确定了下来。为了争取这一光明前途,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协助张、杨,通过对形势的进一步了解把握,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更加具体完备。1936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了和平解决的六项条件,明确指出:“在上述条件有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sup>[1]</sup>。周恩来是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坚定执行者,他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实现了解决西安事变的最佳方案。

西安事变是在中共的积极倡导和亲自参预下和平解决的。中共在西安事变中,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抗日大局为重,不计前嫌,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决策,使中国避免了大内乱,为西安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作出了重要贡献。

### 三、派代表团赴西安,在政治、军事上给予支持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后,形势十分严峻,中共在政治上予以支持,军事上给予援助的同时,还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赴西安,协助解决事变,这主要表现在:

1. 在政治上给予支持。中共中央获悉西安事变的消息时,连夜开会,研究对策,并指示上海、天津、西安等地下党组织,推动人民团体揭发蒋介石对外妥协退让,对内镇压人民,坚持内战“剿共”的反动罪行,并通电全国要求罢免蒋介石,立即召开抗日大会,从道义上给张、杨以声援。1936年12月15日,红军将领致电国民党,对西安事变予以充分肯定,认为他们“宣布之八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停止内战,接受西安方面的主张。1936年12月19日,中共再次

通电全国,肯定了张、杨的正义行动,警告讨伐派“坚持内战,无非自速灭亡”<sup>[1]</sup>。中共的这些行动对于稳定局势、阻止内战起了很大的作用。

2. 在军事上予以配合和援助。西安事变爆发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指示红军主力迅速南下,彭德怀、贺龙率部进驻三原、泾阳一带,徐海东率部进驻蓝田一带,向西安靠拢,以便在讨伐军进攻时,配合张、杨的军事行动。同时,中央还指示红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沉重的打击,促其反省”<sup>[1]</sup>,制止内乱。叶剑英在随代表团到达西安后,专门协助张、杨主持军事。

3. 派代表团前往西安协助张、杨。西安事变爆发以后,如何解决这次事变?如何处置蒋介石?张、杨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于是他们诚心邀请中共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张学良深知周恩来的非凡才能,十分期待周恩来的到来,他说周恩来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来到西安后,不顾个人安危,通过一系列扎实有效的工作,出色的完成了党交给的神圣使命。

4. 稳定西安局势,游说广大官兵。事变爆发伊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感情冲动,要求杀蒋,以泄民愤,更有甚者已经开始策划谋杀行动,此时蒋介石的人身安全极为重要,如果稍有闪失,就极易酿成全国内乱,破坏抗日大计。周恩来等人分别深入到各级官兵中去,晓以大义,耐心说服,使这些官兵逐步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来,为最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这种奇效是张、杨的军事命令所不能达到的。

5. 参预同宋氏兄妹及蒋介石的谈判,直接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当宋子文刚从南京来西安时,周恩来就和他进行了长谈,表明了中共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希望他说服蒋介石停战抗日。1936年12月23日,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了六项主张,在此基础上经过谈判,双方第二天就达成了六项协议。接着周恩来又亲自会晤了蒋介石,他以诚相待,蒋当即答应“与共产党联合抗日。”这样,在周恩来的调停、说服下,蒋介石改变了态度,从而实现了张、杨逼蒋抗日的主张,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条件。正如毛泽东所说: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sup>[2]</sup>。

#### 四、帮助张、杨妥善处理善后工作

西安事变历时14天。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返宁

为标志而得以和平解决。但蒋介石在离开西安后却背信弃义,非但不实现他在西安的诺言,反而扣留了张学良,使西安事变后续工作面临着十分复杂的情况。为此,中共又帮助张、杨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善后工作。

首先,中共与蒋介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督促其兑现承诺。为了指导西安事变后的工作,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要“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许诺的条件”<sup>[1]</sup>。1936年12月28日,毛泽东又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对蒋介石歪曲西安事变真相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进行了义正辞严的反驳,正确分析了西安事变爆发及和平解决的原因,戳穿了蒋介石所谓的“伟大人格”,要求蒋介石兑现其诺言,并警告他“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sup>[2]</sup>。为了督促蒋介石,便于全国人民的监督,毛泽东在声明中还将蒋介石在西安时所允诺的条件公之于众。毛泽东的这个声明,既说明了事变的真相,澄清了事非,又为张、杨伸张了正义。

其次,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事变后继续留在西安,协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关系,维护三位一体的团结,稳定了西安局势。蒋介石回南京后自食其言,不但扣留了张学良,还调兵西进,以武力威胁西安,企图彻底搞垮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面对复杂局势,东北军由于群龙无首,内部发生严重分歧,形成了主战派和主和派,两派之间斗争激烈,相持不下,以致发生东北军将领王以哲被枪杀的“二二事件”大残杀;一些东北军少壮派官兵不仅无理纠缠杨虎城,而且还扬言要对中共代表团进行“兵谏”,杨虎城对此也无能为力。此刻西安的形势十分危急,外有军事威胁,内有战与和的斗争,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使西安事变的成果付之一炬。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临危不乱,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们深入到各级官兵中去,以谈话、演说等形式做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化解他们之间的隔阂和矛盾,帮助他们认清西安事变的意义。经过周恩来等人卓有成效的工作,西安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内乱,西安事变的成果得到巩固,全国的形势也继续向着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

总而言之,从西安事变的爆发到最后的和平解决,无不深深打上中国共产党的烙印,对于中国现代史上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

(下转第90页)

1999年以后为 98% 以上。

全院呈现考研热: 1997~ 1998学年以前报考率为 20% ,录取 15人。

1998~ 1999学年报考率为 30% ,录取 26人。

1999~ 2000学年报考率为 35% ,录取 53人。

其中路 9692班,英语四级通过率为 100%。

2000届毕业生,本科 436人,专科 39人,共 386人获得学位,较以往高出 5. 5%。

全院学生争三好、创佳绩蔚然成风,涌现出了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学院教学质量得到显著提高,得到了学校的高度赞扬。

## (二)创造性教育和创造精神的培养

学院提倡教学实践,为学生创造了宽松的学习环境,使他们敢于、乐于实践。

### 1. 培养创新意识和创造性思维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学院以学生科协为阵地,把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带动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帮助学生消化吸收所学理论,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在新生中开展桥梁模型制作大赛,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并在评选中引导学生对模型的力学原理进行思考,要求学生在以后的基础课和专业课学习中,应用所学知识对自己入校时所制作的桥梁模型进行分析和完善。

### 2. 学生个性的发展

以严肃活泼、渴求新知、教学相长的良好课堂氛围和治学严谨、诲人不倦的科研氛围及院刊、讲座、汇演等为载体,突出学院开拓创新、严谨求实的精神风貌。

(1)鼓励学生探求真知。学院建模小组,连续多

年在国家、省部获奖;英语学习小组,连年获省、国家的奖励。

(2)计算机、网络应用。学院举办相应的活动,增加交流的机会,举行比赛,推动应用水平的提高。通过省三级考试者有 100余人,高级程序员、中级程序员 16人。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求知,培养了学生学习的自觉性。

(3)有组织、有计划进行假期社会实践,提高学生理性的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学院举办思想深、立意新、实践性强和主题鲜明、积极健康的文化节,培养学生的爱国、爱党、爱人民的高尚情操。

3. 不断地调整学生的知识结构,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实行主辅修制,开设公路法、计算机等级、经济法课程,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最突出的表现是就业双选会上我院学生供不应求。

土木工程专业中土建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确立以及在实践中取得的成功,可以推广到整个大土木工程专业中去,为今后在人才培养方面进行更深层研究和实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参考文献:

- [1] 课题组. 土建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研究与实践研究报告[R]. 长安大学, 2000.
- [2] 杜智民. 确立面向 21 世纪交通土建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J]. 唐都学刊, 1996, (6).
- [3] 杜智民. 21 世纪交通土建人才的培养方案和教学改革探索[J]. 理论导刊, 2000.

(上接第 66页)

党自始至终都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积极贡献。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sup>[2]</sup>,其功绩彪炳千古。

## 参考文献: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 西安事变资料(第 1 辑)[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13- 167.
- [2]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6, 228.